



【学者视线之景凯旋专栏】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现代社会不能总是膜拜道德楷模

2005年感动中国人物洪战辉近日作报告时推销自己的新书,引起部分听众不满,觉得这种行为与他们心目中的道德楷模不符,甚至还有人指责他骗学生的钱。对于洪战辉卖书一事,媒体上近期发表了诸多评论文章,总体上来说,舆论倾向于把洪战辉还原为一个现实中的普通人,这的确令人欣喜。

楷模也是人,也要吃饭、生存,获得财富,与普通人没有两样。多年来,公众通过宣传接触的楷模无不是十全十美,大公无私,具有高尚的思想和坚定的理想,没有什么个人利益和享受,甚至不食人间烟火,结果造成模范典型的概念化、标签化和脸谱化,也使一些楷模们因荣誉而不堪重负。结论是,沿用至今的高大全宣传模式存在着误区,忽略了楷模们首先是一个平常的人。

媒体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道德行为标

准已经有所变化,社会急切需要给楷模重新定位,改变目前的宣传方式。不过,我也很能理解反对者的想法,既然是做先进典型报告,顺带推销书毕竟有点令人尴尬。听众要听的是一个坚韧顽强、逆境奋斗的故事,是一个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到的行为,如果洪战辉不愿做“苦难的代言人”,不愿将努力挣扎的不幸放大了给人看,他就应当拒绝做这样的报告。

在这件事中,我觉得双方持论都没有错,错的是双方潜意识中都对道德楷模有着一致的需求,希望依靠楷模来维持社会道德。但首先,洪战辉的事迹无关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他的妹妹是一个弃婴,社会本身对此应当承担起责任,不应把它推给个人,然后来一番先进事迹宣传了事。在这个问题上,谈社会的责任更有意义;其次,洪战辉对家庭的责任和爱出自正常的人

性,这样的事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他对生活的顽强态度固然令人感动,可仍然与社会道德无关。如果说一个人拥有亲情和坚韧也值得大力宣扬,那这个社会面临的恐怕不仅是道德问题了。

问题的实质还不是今天的道德楷模应当是什么样,在我看来,这件事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可以考虑树立道德楷模这种形式是否该结束了。时至今日,这种树立典型的宣传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就像洪战辉如今作报告,也得加进一点好人好事,比如把车票让给同学之类。我不知他在讲这件事时,心里会不会感到很别扭。如果他讲得很自然,那么他已经不再淳朴了。

我们今天面临的恰恰是,什么才是社会的道德基础。每个社会都需要某种维系共同体的道德基础,在西

方社会它植根于宗教,在古代中国它植根于传统。康德曾经试图从理性来论证道德的形而上基础,从而建立起人的道德主体地位,但最终却劳而无功。因为社会基本道德是一个恒常自发的形态,再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承担起提供道德原则的责任。只要社会楷模不是神,具有人的局限,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共同体的道德基础和原则。如果一个社会总是需要依靠楷模来建立道德秩序,那它就只能不断推出新的楷模,不断号召全社会学习。这样的道德原则归根结底是不可确定的,因而也是不可靠、不恒久的。

近几年,不断有学者提到建设公民社会的必要性,我觉得要谈道德问题,这才是一个积极的探讨思路。一个现代国家,并不是要打造一个模范社会,满街都是圣人,而是要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出遵守基本道德的公民。

从“小偷该死”到漠视生命有多远

■公民发言

一小偷在汉口火车站附近偷变压器被烧伤。其妻要求将丈夫立即送到医院救治,但遭到周围的群众阻拦。他们称,他是因为偷变压器时触电的,纯属活该。

(4月22日《楚天金报》)人们对小偷的痛恨之情,既出于公愤——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公共秩序,也怀有私愤——自己曾经有过被窃取的遭遇。因而,现实中屡屡出现与新闻所述类似的一幕:小偷生命受到威胁,现场大众往往冷漠置之不加救助。

制止小偷的犯罪行为,人们自发展开的“围攻小偷”是一种群体性正义。然而,这种正义履行,在小偷丧失“抗拒”能力时就应该终止,在其遭遇生命威胁时更应延伸为更高层次的救援。而坐视小偷在危机中挣扎置之不理,发端于正义的行为其实早已在无形中异化为丑恶。这并不是群体心灵的冷漠麻木,而是一种“污点生命漠视”。

“他是因为偷变压器时触电的,纯属活该”——毫无疑问,这种心态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对于一些给社会造成危害的“污点人”,当其“污点生命”遭遇危机,人们或者出于厌恶而不屑于救助,或者认为救助一个坏人很不值得,“任其自生自灭”便成为群体性的自发选择。

“污点生命漠视”足以折射出尊重生命观念的淡漠,甚至是缺位。一个人,无论是否具有“污点”,其生命权都需要社会的尊重、保护和拯救——不要说一个罪不至死的小偷,即便是一个恶行昭著的杀人犯,我们也应拯救其危难后让之接受法律的制裁,而不是让其在群情的冷漠中死去。从这个角度看,“污点生命漠视”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心态,与“生命漠视”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试想:如果对生命缺乏天然的敬畏,今天我们习惯于漠视一个“污点生命”,久而久之,明天我们也许就会漠视任何一个亟待救援的无辜生命。(王艳)

政府不干预,看病难就能解决了?

■今日观点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教授表示,在医改领域,政府要尊重市场,不能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药价,但可通过对收入较低者实行救济。海闻教授说:“你永远不要以为自己会比市场更聪明。”

(4月22日《新京报》)现在,老百姓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乱象,究竟是尊重了市场,还是相反——行政干预太多呢?我想,用不了海闻教授多说,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然而,海闻教授似乎认为,一切应该任由市场说了算,无论怎样乱下去,政府都不应该干预,只要按照所谓市场规律,总有一天,药价会自然降下来的。真有这样的好事吗?

日前在广东省医疗机构药品网上限价竞价阳光采购谈判会上,有报道说,同一种化学成分的注射液,报价相差253倍!那么,作为非直接消费的特殊商品,药品该不

“信用黑名单”应由第三者公布

■热点纵论

央行已和信息产业部达成协议,同意电信用户缴费信息接入个人征信系统,这意味着,今后,手机欠费行为将作为不良信用信息进入到银行的个人信用档案。最终会让当事人拿不到房屋或者其他消费贷款。

(4月22日《南方都市报》)建立完善的个人征信系统,对驱动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积极作用。然而,这个将电信缴费接入银行个人征信系统的消息一出,却招致一片诟病质疑之声。其原因何在?

将电信缴费接入银行个人征信系统,这样的采信手段,之所以不能让广大消费者信服,原因就在于其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长期以来,电信企业总是与垄断经营、霸王条款、收费陷阱这类话题捆绑在一起,这让电信企业本身的诚信都得不到公众的认可。

该由市场说了算?或者说,要不要进行行政干预?

事实上,政府一直没有停止对药价的干预。近几年中,大规模的下调药价已达20多次,一次次降价,为什么人们仍然感到“看病难、看病贵”呢?有专家曾就药价虚高问题,归纳出三大病灶:一是以药养医。在现行体制条件下,政府不投入,谁来养活医院?只有靠药了!就是说,药品本身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特定补偿功能。二是“价格越高越好卖”。众所周知,目前药品市场的竞争实际上是价格折扣和回扣的竞争,为了能让药品顺利进入医院、药店,生产经营企业便想方设法抬高药价,留下更大的折扣空间吸引医院。三是“马甲”多致降价效果小,一些改头换面以所谓新药名义出现的药品,在脱离监管后价格上涨幅度较大。药品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药养医的需要,医院用药时就有可能在同类药品中较多地选用高价药——用药结构的

变化也促成了药品费用过快增长。

“四大病灶”暴露出当前医疗行业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严重问题,是我国市场发展尚不完善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下,政府的干预是必要且必须的。不能因为干预的效果不大就排斥和放弃干预,正如法律是规范行为以及约束犯罪,不能说规范及约束状态下还有人违法就废弃法律一样。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纯粹的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绝不等于不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目前,在药价明显虚高的情况下,更需要通过国家的行政干预进行调控。市场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关系百姓生命安全的医药领域,政府的有形之手更应该及时地伸出来。现在的问题是,国家不是管得太多而是太少了,不是管得太好而是管得太不好了,如何加强国家干预医药市场的责任,我想这才是一个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张兰英)



【财经纵横之叶檀专栏】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

放行中小银行或可解决排队问题

银行服务最近因为排队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央视经济半小时近日更有报道说,北京工商银行某分支机构甚至出现了员工打扑克、顾客排队却无动。因为社会基本道德是一个恒常自发的形态,再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承担起提供道德原则的责任。只要社会楷模不是神,具有人的局限,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共同体的道德基础和原则。如果一个社会总是需要依靠楷模来建立道德秩序,那它就只能不断推出新的楷模,不断号召全社会学习。这样的道德原则归根结底是不可确定的,因而也是不可靠、不恒久的。

之所以出现“市场化后服务反而变差”的反常情况,主要原因是我国金融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金融机构虽然内部体制逐渐向市场化过度,但市场准入门槛依旧,银行牌照依然是稀缺资源,大中银行依靠存贷差这样的准地租就能过上好日子。只要银行服务供给依然不充分,离行政未远的银行就不可能彻底改变老爷作风。任由顾客大排长龙、我自岿然不动的情况就不会出现根本性改观。

竞争不充分的表现是市场出现配置错位,同质化竞争严重,缺乏面向最大用户的社区银行。现在各银行都开出了大大小小的VIP客户服务窗口,只要你有钱,银行不仅不敢让你排队,还提供超级服务,比如安排旅游,务求讨得大客户欢心。银行也是旧衙门,有理无钱莫进来。不能说这些眼高于顶的银行犯下了多大的过错,因为在市场化的初级阶段,为有钱人服务而不是客户至上才是他们理解

彩票宣传应加上“博彩有风险”

■热点纵论

邯郸银行大盗任晓峰是一个被彩票迷住心窍的人,在逃跑的时候还在想着彩票。他坦言,“我在逃跑的时候连饭都没心思吃,但是我看到彩票投注点就想下车买点,没什么其他想法,就是手痒痒。”

(4月22日《现代快报》)任晓峰为彩票所迷所痴所陷的现实,告诉人们另一个与本案无关的信息:彩票,有可能转变一个人的命运,却绝不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暴富之路。国内博彩业经历的时间不长,其影响却深入人心。博彩宣传的共同特点,都瞄准了人们追求财富的本能欲望,用高额奖金刺激人们的感官,动摇人们的心灵。一方面,人们很难得看到购买彩票潜在的风险,深奥的概率理论

的市场要义。

对于主管部门而言,当面向中小客户的银行服务严重不足的情况,有必要在政策上进行改进。在周三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央行支付结算司司长许罗德表示,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还可以开办定期借记业务,允许居民通过单一账户自动缴纳各种约定好的款项,从而不用去银行排队缴款。4月19日的《文汇报》也报道,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拟推行短信叫号缩短客户排队时间。

要改变银行员工对于中小客户的漠视状况,技术改进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建构面向不同顾客群的合理的市场梯度,如社区银行、地方银行与全国性的大型商业银行,这样才能让不同的消费群体各取所需。如果把上百家城市商业银行与全国性的大型商业银行打造成同一模式,那么,中小客户的利益仍然得不到保障。情况只能是,所有银行在高端客户服务领域进行严重的同质化竞争,把所有业务尽揽入怀,同时对中小客户眼高于顶,以为自己是在为人民牺牲。

尽快放行对中小顾客谦虚的中小银行,让不同的服务供应面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提供不同的服务,赚取不同的利润,才是解决包括客户排队在内等问题的根本。

彩票宣传应加上“博彩有风险”

不是普通百姓所能理解和把握的,即使告诉购买彩票的人获大奖无异于大海捞针,却也有愿意做“大海捞针”的人;另一方面,相关宣传始终把成功的中奖实例公之于众,没有挖掘也很难挖掘失败的博彩经历,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更容易把购买彩票看成了一种投资渠道。

任晓峰告诫仍然痴迷彩票的世人:博彩有风险!同时,这也提醒有关方面,对博彩业的宣传,管理也应该有法可依,用法的形式规范博彩业是时候了,任何博彩宣传和媒体报道,都应附加“博彩有风险,投资须谨慎”的提示语。任晓峰买了很多彩票,一次都没中过,欲望,用高额奖金刺激人们的感官,动摇人们的心灵。一方面,人们很难得看到购买彩票潜在的风险,深奥的概率理论

让芙蓉姐姐去北大讲课吧

■异论锋生

芙蓉姐姐称她接受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8所高校社团的邀请,将于近期开始“十八所首都高校巡讲”。

(4月21日《新民晚报》)对于芙蓉姐姐的高调出境,相关高校冷若冰霜。记者连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所高校,他们均否认曾邀请芙蓉姐姐来给大学生开讲座。相关人士表示,芙蓉姐姐不是个成功的人,没有资格像许多名家一样来给大学生讲课。

看来芙蓉姐姐的热脸贴在了高校的冷屁股上。而芙蓉姐姐高调宣称的“十八所首都高校巡讲”,也都是芙蓉姐姐的一厢情愿和自我炒作。对于相关高校结成联盟一样扎紧自己的篱笆,将芙蓉姐姐如洪水猛兽般拒之门外,相信有许多的人要拍手称快,要等着

看芙蓉姐姐的又一个笑话。

其实,芙蓉姐姐是洪水猛兽吗?恐怕未必。她只不过是网络时代衍生的一个另类,是一个靠自己努力而实现自己梦想的女人。我们可以不耻芙蓉姐姐的行为,但是我们要尊重芙蓉姐姐的存在。而芙蓉姐姐预计将和学生们探讨的问题,也许正是高校不能教给学生的。最难能可贵的是,考虑到大学生没有固定收入,芙蓉姐姐决定不收出场费。

让芙蓉姐姐去北大清华讲课吧,天塌不下来。或许,相关高校是想通过拒绝芙蓉姐姐的冷傲,来表明自己大学的纯洁和高雅,来证明今日的大学还是追求学术和独立特性的象牙之塔。但是,在演艺明星都可以被大学争相聘请当客座教授、名誉院长的今天,芙蓉姐姐怎么就不能和大学生们进行座谈。能不能容忍芙蓉姐姐,何尝不在检验着高校的包容性。(李成仁)

本版文章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